

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前后

□ 张大勇 宋敏 孙宇中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被誉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坚定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制定和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廓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认识,推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回到延安，处处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他还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批评，多次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擅自发表背离中央方针的演说。王明的独断专行，严重影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鉴于此，中央决定派一名政治上过硬、党性极强，同时又熟悉中国抗战形势的同志去莫斯科，宣传和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支持。1938年3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4月14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任弼时还注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生动翔实的事例积极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宣传中国形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经过任弼时等人的积极宣介、有效沟通以及不懈努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此后不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又向任弼时、王稼祥明确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8年9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以出色的才干和政治智慧，圆满完成了出使共产国际的重要使命。

筹备召开七大,从思想和组织上强化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此后出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日常工作中，他越来越感到党内一些不正确的

思想言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合理的机构设置，严重影响了党的抗战事业，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任弼时提出建议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机构调整，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大大提升了中央机关的工作效率。他特别强调党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无条件服从党中央。1943年3月，任弼时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担任召集人。其间，他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还亲自参与决议草案的撰写与修改。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前后，任弼时主持完成了决议草案的初稿。这一稿的突出特点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半年多的时间里，任弼时带领起草组数易其稿。最终决议由毛泽东亲自改定，并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作为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精彩演说。他动情地讲道：“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为大会奠定了团结、胜利的主基调。

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年41岁的任弼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不遗余力坚持和发展党的七大路线,协助毛泽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国

七大后，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兢兢业业、笃行不怠，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战场，带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参与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组织实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以25万兵力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中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领导的分工决定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人员编入中央纵队，并出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分别前，刘少奇和朱德反复叮嘱：“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时时刻不忘刘少奇和朱德的嘱托，除了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还直接负责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保障以及对敌侦察等工作，出色完成了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重任。

任弼时还十分关注队伍的思想情况。一些同志对中央放弃延安的决定不理解，任弼时对大家解释道：“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有些同志可能想不通，告诉同志们，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任弼时帮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有效提升了队伍的信心和斗志，为粉碎敌人进攻、胜利转战陕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土改问题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在掀起土地改革运动高潮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也出现了“左”倾错误。任弼时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中央领导之一。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一方面大量阅读各地转发来的土改情况汇报，另一方面深入乡村，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询问群众对土改的意见，掌握了许多一手材料。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由任弼时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关于土改的新策略和新方针，使“左”的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在毛泽东、任弼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各解放区土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党的七大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革命领袖
在党的七大前后

新四军和浙江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浙江安吉孝丰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范人杰

孝丰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革命烈士陵园内。为纪念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烈士，在当年战役的主战场建起了纪念碑。纪念碑高12米，碑体正面镌刻着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体后有一副碑，副碑上刻有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六月，以粟裕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东南地区，向浙西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中，取得了孝丰三次反顽自卫战役的辉煌胜利。

这年二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疯狂进攻，我军奋起抗击，与顽军激战于上堡、孝丰隘口塔山岭、大阳山一线，历时五天五夜歼敌一千七百余余人，解放了孝丰。尔后顽军不甘失败，纠合十二个团的兵力向我孝丰地区大毛山、坝山、青明山等阵地反扑，我军坚守阵地，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战斗了七天七夜，击退顽军，歼敌一千七百多人，迅速进占了东、西天目山区。这年夏，顽军七万五千余人向我孝丰地区卷土重来，我军以寡敌众战胜饥饿和疲劳，迂回穿插连续作战半个月，歼敌六千八百余人。这三次反顽战役，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近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的猖狂进攻，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了浙东南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党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四军和浙江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纪念在孝丰三次反顽自卫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弘扬铁军精神，激励后人，今特刻此铭，以永志不忘。

烈士精神，万古长存！

安吉县人民政府
二〇一五年八月立

碑文高度凝练了天目山三次反

顽战役的主要过程和辉煌战绩，读后令人肃然起敬，77年前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奋起反击敌顽聚歼阴谋

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是1945年上半年，新四军苏浙军区在以孝丰为中心的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发起的三次自卫反击作战，亦称“孝丰战役”。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了“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的战略部署。1945年1月，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下天目山区，并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着手整编南下部队，统一指挥抗日斗争。正当苏浙军区厉兵秣马，准备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反攻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第三战区所属的苏浙皖挺进军集中5个团兵力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妄图“再打一个茂林战役”。

经过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新四军广大将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顽为了抗日，抗日必须反顽。面对着顽固派军队的汹汹来犯，1945年2月至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粟裕的指挥下，以少胜多，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聚歼苏浙军区主力的阴谋，取得了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光辉胜利。

新四军三次反顽战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945年2月10日，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自长兴槐坎出发前往莫干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三纵队七支队长经鄞吴进至景坞、上堡一线。12日，顽军5个团对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企图“解决”三纵队七支队。苏浙军区予以坚决还击，并在占领孝丰县城后按照党中央指

示主动停止追击。

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后，顽固派不甘失败，再度纠集12个团在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的指挥下兵分4路卷土重来，形成了对孝丰的包围。3月6日至8日，苏浙军区一纵队和三纵队以寡敌众，无惧牺牲，牢牢守住了孝丰坝山、石鼓山、黄泥冲等阵地。在黄泥冲战斗中，三纵队七支队前卫三营八连三排副排长季少青身负重伤，但置生死于度外，冲入敌群，拉响手榴弹……在这种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新四军发起反击，并乘胜占领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顽战役的光辉胜利。

5月27日，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先后调集14个师75000余人再次袭来，企图围歼新四军或将其驱逐出天目山区。6月，苏浙军区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先佯装撤出新登和临安，后又撤离东、西天目山向孝丰集结，造成溃退假象。顽军不明所以，骄横冒进，在孝丰五峰山、大毛山、水口等地遭新四军迎头痛击。第三次反顽战役中，新四军大量歼敌，并迫使顽军退出临安，准备放弃临安、新登一线，我军终在浙西站稳了脚跟。

提前实现了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战略大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而新四军苏浙军区正是抓住了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这个时机推动了这种转变的提前实现。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经过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浴火淬炼，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学会了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打运动战的本领，广大指战员进行运动战的军事素养有了质的提高，同时也为粟裕个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指挥大兵团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良璋:为真理而牺牲的天之骄子

□ 方东杰

况等写成一份约达两万字的“国民党空军概况”交给了党组织。由此开始了他的潜伏之路。

利用身份之便传递情报。1946年，国民党在北平成立空军第二军区，赵良璋奉命调任司令部总务科任交接参谋，主要收集有关空军的情报。

当时，第二军区司令部的机密情报、新编写的密码等，都由赵良璋一手包办并亲自送往南京国民党空军总部。有了这样的便利，许多消息南京总部还没有收到，延安就已经知晓。甚至连国民党军司令部印制辖区兵力番号表、北平行轅作战时的辖区部署态势图，也在赵良璋调任不久，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为了获取多方面情报，赵良璋想了很多办法。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的官太太喜欢打牌，赵良璋就苦练打牌技术，陪这些官太太们打牌，在无话不谈的牌桌上，得到了不少情报。为迅速完成抄写任务，他还利用其他工作人员休息、赌博、跳舞的机会，苦练抄写速度。

赵良璋获取的情报不仅有国民党空军的调动情况、部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及数量等等，还对空军人员的内部思想动态也进行了分析。这些情报帮助共产党了解了国民党空军的基本动向和他们的特点，为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上作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帮助。

1947年1月，在北平工作期间赵良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共情报人员在各地国民党空军中扎根，搜集到了更多地区的空军情报。

雨花英烈谱写忠诚赞歌。1947年9月，北平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国民党特务从床下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就有赵良璋传递的情报。

随后，赵良璋等多位同志不幸被捕，一个月后被押送南京。狱中，他严守组织纪律，即便严刑拷打，也未吐露党的秘密。为了掩护同志，他甚至把别人的一些活动也揽在自己身上。赵良璋的英勇举动，确实掩护了几位空军战友，朱铁华就因此被敌人判定只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但尚未成功”，最后得以释放。

在阴暗恐怖的牢房内，赵良璋非常乐观，他还创作革命歌曲，教同志们唱歌《囚徒之歌》：

火山终有熄灭日，
黎明之前必黑暗、黑暗、黑暗！
囚徒要解放，
时候一到起来反抗，
打破了牢笼奔他方。

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泄露军机”为名，将赵良璋与同一事件被捕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一起秘密杀害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赵良璋在就义前写给难友的绝笔信中写道：“我是带着勇敢与信心就义的。我虽倒了，但顽强的性格仍使我精神永不灭亡。”

党史人物